

约签署，成了整个中国的屈辱。那么大的打击，整个国家都没有被唤醒。但当时社会生活里出现了报纸，有了这样一个之前没的公共舞台，知识分子可以辩论：中国该向何处去？日本“明治维新”是怎么发生的？保守封闭的国门被打开，他们那时候的讨论，和我们现在讨论IDA是怎么回事、大数据是怎么回事，其实心情可谓如出一辙。

当时理解这些东西的人很少，梁启超懂。他身上这种迫切感、使命感……他一定想大声告诉大家，世界是这个样子的！我们要抓紧，国家才会发展起来，慢慢强大。从事新闻工作的，看到各种东西立刻消化，自己写文章转述出去。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太稀缺，立刻让所有人欢呼，满足了他的虚荣和成就感，然后这些认可，促使他做更多事情，人生都是这样。

腾云：在书里，你不光是写梁启超，还写了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，为什么采用了群像式写法？

许知远：我很努力把他还还原成人的故事，因为我们很多历史写作，人是消失的，缺少他个人的成长故事。

梁启超和他的朋友们，就是一个小团体，他们当时也觉得被孤立了，他们也在到处寻找自己的同志，而且他们也需要历史参照，他们要读龚自珍，读王阳明，包括读日本明治维新的一代人，他们在不同的时空寻找力量。

人是脆弱的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重要，梁启超碰到汪康年以后，在和朋友的讨论中，他知道了自己究竟想寻找什么东西，想做什么。他们办《时务报》，就是几个

右图：许知远主持的《十三邀》，在网上曾饱受争议。



朋友一起办起来的。

腾云：你写这本书，找资料查证了一千多本书？

许知远：就写传记来讲，梁启超的个人资料太稀缺了，找不到那么多个人资料，无法把他的性格更鲜明描述出来，没有资料来支撑，把他的日常生活，写得更好看一些。

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克服这个问题。我们没有西方的传记传统，讲究理解人物生活在自己对应的时代之中、一个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。缺乏多维度事物认知的象征和标签，人物都是在行动，很少探测他们心理。

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读者看到人物生活的画卷。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，听什么音乐，看什么戏，怎么旅游，怎么跟朋友写信，诗中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……把个人行动和思想，还原到他的生活情景里去。

腾云：写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

么？

许知远：这本书写了三四年，经常断线，然后再去查资料，找了各种关于梁启超的史料，觉得哪些东西有用，就开始在电脑上打出来。摘抄的过程当中，慢慢对这个史料有了感觉。这几年，我不管去哪里，都随身携带着，有空的时候就看一看，等待灵感的降临，等待这些材料发生关联，产生逻辑。书印出来的时候我翻了一下，怎么那么多引述和注解？查历史资料，费了很大功夫。

如果我现在重新再写这本书，有些地方会处理得更好一些。当时写的时候，还是有点匆忙的。文学家书写历史，都是在帮助读者扩展情感，而不是要找一个思路，一个答案。梁启超不能提供答案给具体的年轻人，但可以给你提供某种参照：他们面对绝望的时候，怎么表现出勇敢？面对焦灼和犹豫怎么做